



焦占宝烈士英雄事迹

家乡出英雄而乡里不知,英雄为人民牺牲家人却不晓,这确实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焦占宝,一位热血男儿,早年参加革命,经历了 革命战争期间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几段最艰苦的岁月,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出生入死,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他由一个纯真的少年成长为新 四军一位年轻的优秀指挥员。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在与日伪军的激战中负重伤而牺牲。自此,一抔黄土埋忠骨,他的名字被湮没在浓 浓的战争硝烟之中,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焦占宝出生在宁夏中卫县宣和镇羚羊村一 个普通农民家庭。羚羊村因闻名遐迩的羚羊寺 而被外界所知,羚羊村也因羚羊寺办学校历史悠 久而学风盛行。焦占宝家并不宽裕,可父母省吃 俭用,送他到羚羊寺上学。少年焦占宝体格健 壮、天资聪慧、心地善良,又勤奋好学,学习成绩 一直名列前茅。受乡俗的影响,他还爱好音乐, 二胡、笛子、三弦之类的乐器都初具基础。知识 开阔了他的视野,文化增加了他的智慧,器乐陶 冶了他的情操,求知心切的少年盯上了更高一级 学校的课堂。然而无情的现实却打破了他纯真 的求知欲望。当时,宁夏的国民党军阀马鸿逵随 蒋介石一道反共反人民,不仅横征暴敛,敲诈勒 索,搜刮民财,还强抓壮丁,扩充军队,以镇压人 民的反抗,妄图消灭红军。兵源枯竭时,连四五 十岁的半老头、十四五岁的小孩子也不放过。多 少家庭因此而家破人亡,多少青壮年为躲避抓壮 丁逃进深山,逃往他乡。少年焦占宝无法继续学 业,只好逃到香山深处的伯父家躲藏。

1936年,西征红军到达中卫香山地区。红军 严明的纪律,官兵一致的民主作风,爱国爱民团结 抗日的宗旨,打土豪救穷人的活生生事例,给少年 焦占宝以巨大震动,仰慕之情油然而生。他痛恨欺 压人民的国民党部队,敬仰为人民打江山的革命红 军。正在山坡犁地的他满怀一腔热血,毅然抛下犁 杖,投入到红军队伍之中。这一年他16岁。

男儿有志报国走四方。从此,他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走上了一段辉煌的人生历程。他参加 了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宁大会师和山城 堡战役,西安事变后,又随红十五军团进军商县, 准备迎战国民党亲日派军队的进攻,以保障西安 地区的安全,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 张。卢沟桥事变后,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一 一五师三四四旅,他被编入六八七团,任团政治 处宣传队员,随部队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9月25日, 一一五师主力发动了震惊中外 的平型关大战,焦占宝和宣传队队长屈振东跟随 第一线作战指挥的副团长田守尧冲入敌阵,展开 血战。田副团长不幸负伤,焦占宝配合医务人员 冒着敌人的炮火将田副团长救下火线。1938年1月, 焦占宝随部队开辟平山、灵寿等抗日根据地,参 加了一系列战斗。2月,三四四旅越过正太路,进 入晋东南,参加了粉碎敌人"九路围攻"的张店、 町店战斗。焦占宝除参加战斗外,还进行战地宣

由于焦占宝学习努力,思想进步,工作积 极,作战勇敢,于1938年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1939年初,焦占宝调任六八七团二营青年 干事。他小学时期学到的文化知识和扎实的音 乐功底,进一步派上了用场。他深入连队活跃部 队文化生活,激发青年战士的抗日热情。后任指 导员,成长为一名政治工作干部。

1940年春,三四四旅奉命下太行,经冀、鲁、 豫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同年6月跨过陇海 路,到达安徽涡阳地区,与新四军六支队会师,三 四四旅改编为新四军四师十旅,焦占宝参加了开 辟淮上抗日根据地和皖北反顽的斗争。1941年5月, 焦占宝又随部队东越津浦路,进入皖东北洪泽湖 周边地区,巩固扩大皖东北抗日根据地。9月,部 队又奉命北渡大运河,进入淮海抗日根据地,继 续坚持抗日斗争。此时的焦占宝在旅政治部任 干事,后任团总支书记,参加过数次反"扫荡"作 战和高沟、杨口等战役战斗。1943年初,焦占宝 调任新四军三师十旅兼淮海军分区二支队六团 政治委员,后又改任五团政委,对部队思想政治 工作、干部培养和军事训练作出了贡献。1944年 9月6日,淮海军分区集中二、四支队乘敌立足未 稳,奔袭进占宿迁境内运河线上林公渡的日军 "王牌"金井中队和伪军一个中队,五团担任主 攻,政委焦占宝亲临一线指挥,经过激战,打死日 军66人,活捉两名日本兵,毙伤伪军90余人。林 公渡战斗的胜利,给当地人民极大鼓舞;战后,当 地6万群众夹道欢迎子弟兵胜利归来。

1944年12月5日,在淮海周边地区日伪策 划下,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孙良诚部第四、第五军 共1.6万余人,南下向我苏北抗日根据地进犯,十 旅兼淮海军分区集中一、二、三支队,于12月6日 夜向大伊山发起进攻,阻止孙良诚部南下。二支 队各团顶着寒流袭击,渡过结有薄冰的河流,攻 入大伊街区,与守敌展开激战,街区大部守敌被 消灭,日军主力退守街中心坚固堡垒负隅顽抗。 五团政委焦占宝指挥第一梯队向坚守堡垒之敌 发起猛攻,不幸身负重伤,当即被送到后方急救 站抢救,因伤势过重,于1944年12月8日牺牲于 江苏省灌云县汤沟以北的农村,时年24岁

焦占宝参加革命后,曾给家里寄来没有固定 地址的信和东西,可这些信却被宁夏国民党地方 政权截获。时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不久 宁夏军阀马鸿逵对民族统一战线阳奉阴违,仍然 残酷镇压人民的抗日活动,迫害共产党人。他们 把焦占宝的父亲焦太抓去,吊打拷问红军战士 焦占宝的底细。其实,对于儿子的事,焦太什么也 不知道,但这次拷问却使焦太从反动派那里知道 儿子当了红军,干的是让他骄傲的中国人民最伟 大的革命事业。从此,他盼望思念儿子的那颗心

一直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儿子仍无消 息,他不知到什么地方去问,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 找。想起儿子,老两口相对无语,默默流泪。这 种无尽的思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老两 口相继离开人世。

1999年,焦占宝的外甥——在宁夏海原县中 学任教的高强,从《海原县志》中看到1936年在兴 仁堡(和中卫香山毗邻)参加红军的张元和,时任 江西省军区司令员,便试探着去信询问,张元和司 令员给高强介绍了另一位知情人——苏州干休所 的正军级离休干部韩曙。韩曙得知情况后惊诧不 已,怎么到现在焦占宝牺牲的消息家里还不知道?

焦占宝负伤的第二天,同在二支队的四团 政委韩曙赶去看望。焦占宝意识到死神已经临 近,对他说:"我为革命而死,死而无憾,你是我 的战友,也是好朋友,如果你能活到革命成功, 请你给我家报个信,让家里人知道我是为中国 革命而死的,我的家乡在宁夏中卫焦家营子。 (焦家营子为现在的羚羊村)韩曙紧握着焦占宝 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如果我能活到革命成 功,一定给你家报个信。"第三天,也就是12月8 日,焦占宝同志光荣牺牲,因部队有新的任务, 韩曙未能给焦占宝送葬。后来,韩曙随部队转 战各地,长期处于紧张的战斗环境,已想不起 焦占宝家乡的详细地址。1970年,韩曙因公到 中卫县,这令他想起焦占宝是中卫人,但具体村 子已无法想起。他以姓氏叫村名的习惯,试探 着询问县革委会领导:"中卫有没有焦家营子? 有没有当年参加红军的焦占宝?"革委会的同志 说有,并说解放后,焦占宝同志一直没有给家里 来信,县里估计他已经牺牲了,给予焦占宝的父 亲"革命烈士"家属待遇,每月给他20元抚恤 金。韩曙听后非常高兴,向县革委会负责人详 细介绍了焦占宝的情况。他本准备过河看望 焦占宝的父母,可因当时天降大雨,黄河水暴 涨,渡口停渡,愿望没有实现。时隔19年,看到 高强的询问信后,才知道当年县革委会的人竟 是那样轻易地把他欺骗了。他没有完成战友的 嘱托,深感内疚懊悔,遂不顾年事已高,身患疾 病,赶忙翻找资料复信,详细介绍了焦占宝同志 的生平事迹,并寄来了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 出版的《新四军辞典》和《一一七师师史》中记载 的焦占宝的生平事迹复印件。这迟到了60余年 的英雄事迹才终于在烈士家乡得以大白。

焦占宝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丰富而传奇的 战斗经历,足以告慰他父母的亡灵,更足以抚慰 他在世的亲人,他的事迹令家乡人民感到骄傲 和自豪。 (据《吴忠文史资料》第三辑)

将台堡:红军长征史上最后一次会师



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

西吉县将台堡,是古丝绸之路上一处军事要 塞,又称西瓦亭。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 面军在这里胜利会师。

宁夏是红军长征途经的战略要地,回汉两族人 民见证了80多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战斗岁月和革

红军长征主要有8次大的会师,前面七次分别 为江西重溪会师、贵州印江会师、四川懋功会师、甘 孜会师、甘泉县下寺湾会师、会宁会师,陕北吴起镇 会师。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讲解员唐睿楠 说,宁夏将台堡会师是红军最后一次大的会师。

1935年7月,为配合红军主力北上行动,红二 十五军转战至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并翻越 六盘山,驰骋陇南、陇东,截断西兰公路,打乱了国 民党军围堵中央红军的部署。中央红军陕甘支队 1935年10月5日从甘肃界石铺、高家堡等地出发向 六盘山挺进,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

1936年5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组 成西方野战军,进入陕甘宁边界地区作战,以实现 扩大、巩固根据地和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战 略目标。9月初,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一部 分兵力保卫苏区,主力挺进西兰公路,占领海原、靖



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策应二、四方面军作战;红 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岷州、武山等地,继续向东向 北进军,会同红一方面军向定西、陇西及西兰大道 进发,吸引与消灭国民党毛炳文部队;红二方面军

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南部,建立苏区,以实现红 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

1936年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 胜利会师。21日,红二方面军长征进入今西吉县 境。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 关向应和随二方面军行动的原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在 西吉县平峰镇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 权、政委聂荣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等亲切会面。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红二军 团到达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二师胜利会师。红 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并红六军 团首长陈伯钧、王震等,红一军团领导人左权、聂荣臻、 邓小平并红二师首长杨得志、肖华等参加了会师。

"会师部队在将台堡东侧广场召开了规模盛大 的联欢会,欢庆胜利。"唐睿楠介绍,参加会师的部 队有11500多人。红一师三团政委肖锋代表红一方 面军把数万斤粮食、5万块银元、20头肥牛、200只 肥羊、1000套棉衣、数百张羊皮、2万斤羊毛和3架

缝衣机赠送给红二方面军。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代表红二方面军全体将 士向红一方面军干部战士表示谢意。贺龙总指挥 笑着对肖锋说:"谢谢一方面军同志的关怀,多年来 盼望见到中央红军,今天终于实现了!请你回去向 毛主席和其他同志问好!"

台堡会师模拟场景图

红一军团首长左权、聂荣臻、邓小平给毛主席发 电报,报告了与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及红二军团、红六 军团、红三十二军首长会面和慰劳部队的情况。

10月24日,红一方面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 在将台堡向红二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传达了党的瓦 窑堡会议精神和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 略》;并作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红二方面军 的将士当即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政策!"贺龙同 志听了报告后高兴地说:"这下好了,从此以后我们 就可以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之下了。

西吉县将台堡长征会师纪念园负责人张玉忠 介绍,红一、二、四方面军历经两年多的艰难困苦, 浴血奋战,终于在将台堡实现会师,胜利结束了伟 大而艰巨的长征,实现了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团结和巩固了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促成了中国 革命从转折走向胜利。 (据《中国青年报》)

灾荒救助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社会政 策,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把"赈济灾荒"作为改善人民 生活的主要内容。1939年4月4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抗 战时期施政纲领》把"救济难民灾民"作为主要施政方针。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中枢,因此,抗战时 期中共在边区实施的灾荒救助与备荒政策,在当时具有一 定的示范作用,对于当今救灾、防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灾荒与边区政权

抗战时期是陕甘宁边区自然灾害的频发期,据不完全 统计,1939-1945年中,边区农田受灾面积达2553.7万亩, 损失粮食123.3万石,受灾人口160万人次。因边区地瘠民 贫,每次灾荒的发生,都导致当地居民生活困难,甚至发生 饥荒。如1941年春陇东分区大旱,当地灾区居民每日两餐 "多吃苦菜、蒿头子、榆树皮,掺一些五谷面和食";1943年 春荒时期,镇原县大部分居民发生缺粮食与草料现象,饥 民占居民总数的37.9%。

灾荒给边区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是居民逃亡严 重。1941年旱灾中,环县洪德区有240家灾民无法生活,逃 荒到曲子、庆阳、华池等地;1942年春荒中,盐池县百姓纷纷 外逃。二是社会问题严重。一些地区发生灾区人民抢劫公 粮、合作社、乡政府的严重事件,如1942年青黄不接时期,安 塞区第六区公粮、合作社、乡政府被当地民众所抢,同时,志 丹也发生群众抢粮与骚乱事件。三是被政治土匪利用。 1939年春环县发生严重旱灾,受国民党支持的政治土匪利用 环县政府在征粮、征兵中存在的问题,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发动叛乱,县北中共政权的4个区政府 和14个乡政府被破坏,还有学校、合作社遭到抢劫,损失不少 粮食、公粮代金、枪支等。这是抗战时期发生在边区最严重 的政治事件,说明灾荒使中共基层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荒政体系建立与救助

中共为消弭灾荒带来的基层社会动荡,一方面加强政 权建设,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解决民生问题,而积极赈济 与建立备荒制度是解决民生的主要内容,也关系到民众的 情感和信任问题。赈济灾荒是抗战时期中共民生政策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根据地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抗战时 期边区的荒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健全边区的灾荒救助体系。边区的赈灾机关是 由苏维埃时期的陕甘革命苏区互济会演变而来。互济会 是苏维埃政府内务部的附属机构,尽管其性质是以救济 "被难"红军战士及其家属为宗旨,但从现有的文献看,互 济会也从事民间灾荒救济。1938年9月2日,边区政府成 立赈济委员会,1940年3月,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为了 加强赈济工作之领导及推行,各县应立即组织赈济委员 会,委员5至7人,以县委书记、县长、县互济会主任、后援 会主任、保安队长及当地驻军长官组成。县委书记或县长 为主任委员,切实负责领导与推动赈务之进行。"随之各县 陆续成立赈济委员会,主要负责边区灾荒救助工作。除了 赈济委员会外,在大灾之年还设立临时机关负责救灾。

边区制定灾荒救助政策。1940年3月30日,中共和 边区政府作出了《关于赈济工作的决定》;1941年5月27 日,边区民政厅发布《关于赈济灾难民的指示信》等。根 据这两个文件,把边区的赈济政策归纳为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做好放赈前的灾情调查统计工作。文件要求 "调查统计灾民难民及移民的数目,合理施放";在调查统 计好之后,"按人数多寡及需要救济的程度,分别给予适 当的救济";但"凡是急需赈济者,而当地群众又无法调剂 者,应即时给予救济,无需死板的一定要待调查统计好再 进行救济,就会失掉了救济的作用"。二是坚持民主与公

平原则。灾情调查"应发动群众参加这一运动,每一次要救济者,必须经过 群众的讨论";"要注意纠正过去一般化、平均分配的救济方式和干部的私 情观念及营私舞弊等,真正做到公平合理";民政厅要求"最好由难民们讨 论如何放法才为合理,才能真正地解决灾民饥寒的实际问题。反对敷衍塞 责,反对贪污,反对私情观念"。赈济必须使"受救济的贫苦人民得到实 惠",以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使人民与政府更加亲密起来"。三是规定 赈款、赈粮发放程序。经过调查、群众讨论并确定数量后,"以区为单位的 经过县赈济委员会的审查核准",将赈款、赈粮发到灾民手中。每次赈济完 成后,应做详细的工作总结。四是采取多渠道积极的赈济措施,帮助灾民 讲行生产

边区政府的赈济活动。边区的赈济主要包括救济春荒、急赈、民间互 济与调剂、允许民间借贷等多种方式。救济春荒是边区赈济工作中最主要 的组成部分。1940年发生春荒,为保证春耕生产,边区拨出现款40425元、 小米880石对三边分区、关中分区、安塞、神府、延川、安定等进行赈济。同年 六七月发生水雹灾后,边区政府拨款8万元,粮900石进行急赈。1941年2 月,因曲子、环县、神府、靖边发生饥荒,边区民政厅拨粮3470石,款7万元进 行救济。还动员富裕户拿出存粮救济周围的灾民,如靖边县动员富裕户出粮 394石,帮助灾民度荒,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942年春,曲子县政府为保证春 耕顺利进行,根据边区政府指示拿出公粮90石借给困难群众,还借给群众公 草52万斤解决耕畜草料问题。1945年大旱后,一方面边区政府拨粮300石进 行急赈,还发动群众互济。此外也允许民间借贷,边区政府不拘一格的赈济 方式,不但帮助困难民众度过饥荒,而且对发展农业生产有重要的意义。

发放农贷也是一种赈济方式。1942年环县发生旱灾,边区政府在发赈 粮30石、赈款1500元的同时,还发放农贷10万元,用于购置种子、耕牛、农 具。边区各级政府还发动募捐救灾,1942年水灾后,边区成立的救灾临时 委员会发起了救灾募捐活动,得到各机关团体的热烈响应,共计募款 71914.2元(边币)、衣服153件等。在此次募捐中,商会系统募捐19500元, 公营商店募捐6000元,民众剧团募捐12000元。延安市机关募集款5.1万 元,细粮3.6石,衣服60余件。1945年关中大旱后,新宁县不但捐助小麦、苞 谷,还捐牛、驴和农具帮助灾民恢复生产。通过各种募捐活动,在边区形成 了全民关注与救济灾荒的社会风气。

灾荒是对中共各级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边区除了赈灾,还积极组织 灾后重建,帮助灾民恢复生产。1941年6月,为帮助灾民进行生产,边区给 三边、陇东、延安分别拨赈济款帮助灾民购买种子、农具。1943年9月,志丹 等地区遭遇雹灾,灾情严重,志丹县政府召开政务会议,讨论救灾和重建办 法。绥德县政府在雹灾后,采取对灾民酌减公粮、组织贫民移民南下开荒、 发动家庭妇女纺花等措施恢复生产。

边区采取积极的备荒政策。抗战时期边区还积极采取备荒政策,主要 是恢复传统的义仓制度。边区首次倡导义仓、义田的是新正县三区雷庄乡 乡长张清益。办法是发动民众"投工开出一份公共的荒地,公地产的粮食 归大家所有,统一储存使用"。为了管理义仓,由全村公推委员5人,对义仓 进行管理。张清益创办的义仓及其管理模式在边区得到推广,首先在新正 县和关中分区得到响应。1944年边区普遍建立了义仓,开垦了义田,有了 义仓粮。关中新正有义仓56个,义田1900亩;赤水义仓29个,义田920亩; 淳耀义仓25个,义田500亩;新宁义仓43个,义田1300亩。1945年,陇东分 区有义仓67处。1945年春夏发生旱灾,西北局发出防旱备荒的紧急指示, 要求充实和建立多样化的义仓,各地普遍建立了义仓。

抗战时期,自然灾害不仅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 考验着中共在边区的执政能力。这一时期,中共十分重视灾荒救助,一方 面着手建立现代救荒系统,健全救助机构和建立救灾制度;另一方面,利 用与嫁接传统的备荒机制,发动民众建立义仓。总体来看,抗战时期边区 的备荒政策是积极和有效的,也反映了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边区不仅面 临着经济困难,又遭受了两次大灾害,即1940年的大旱灾和1942年的大 水灾,使边区进入抗战最困难时期。中共各级政府采取了积极应对的态 度,对灾民进行积极救助,使灾区人民能够平安度过灾期,灾后通过政府 农贷和民间调剂等方式,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产,使边区经济社会建设保 持了良好的态势。 (据《光明日报》)